

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58〕，頁1-6）中回顧指出，重在「確定民族成份和族稱」。僅1954年，雲南省就上報二百六十多個族稱，調查者結合「名從主人」和引導說服的方式，漸次界劃民族成份。在此背景下成書的「民族問題五種叢書」恰成一時代思想、活動之縮影。成事於世紀之交的「雲南民族村寨調查」有意從前人的肩膀出發，理應回應1950年代民族調查的觀察與研究；提供村寨變化概貌的同時，我們更期待調查者在問題意識上有所反思和超越，而非在相同或全新的調查點上「另起爐灶」，對已有的調查漠然視之。

筆者相信，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有意深刻了解西南族群生態現狀的讀者，皆可從這套叢書的豐富調查資料中汲取教益。讀者高明，自有評斷。不過，在面對數十年來中外學界已有的豐碩族群理論和調查研究成果的時候，如果我們有心在這片領域上繼續開墾，也許更需要首先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的鋤頭究竟應該從哪裡下手？

陳賢波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松田京子，《帝國的視線——博覽會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6，225，4頁。

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這是清政府唯一舉辦過的全國級別的國內商業博覽會。整整一百年之後，2010年，上海將舉行世界博覽會，這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值此百年歷史機遇，讀讀有關博覽會的研究，還是頗有興味的。

松田京子的《帝國的視線——博覽會與異文化的展現》一書，以1903年日本在大阪舉行的第五屆國內勸業博覽會為研究對象。本書除〈序章〉和〈終章〉之外，分為五章，第一章題為「博覽會的『場』——第五回國內勸業博覽會與大阪」；第二章題為「臺灣館：殖民地展覽館」；第三章題為「作為調查和收集的『知識』——伊能嘉矩與臺灣風俗調查」；第四章題為「學術人類館」；第五章題為「人類學與『展示』——人類學者坪井正五郎的思想」。

松田京子在序章指出，19、20世紀之交，是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交織的時代，「民族意識」與「帝國意識」是一個錢幣的兩面，套用松田京子原著

的話，這兩種意識有着「相即不離的關係」。世界大部份地區，被納入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少數帝國主義國家，把全球約四分之一的地區進行殖民、宰割。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建立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體制，並通過一系列對外戰爭，也建立其亞洲「帝國」的地位。而體現這一複雜、深遠、急劇的時代轉變過程的場合，就是1903年大阪第五屆國內勸業博覽會。這個博覽會，通過展現「異文化」而確立日本的「自文化」，鞏固日本帝國的「我者」與日本以外的「他者」的等級差別。這個把「文化」展現於人們視野的過程，本身就有其政治意味，要掌握其政治意味，必須結合日本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脈絡。

在這次博覽會中扮演着「異文化」和「他者」的，主要是當時已經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據第二章介紹，臺灣館內除了各種臺灣的土特產品之外，也介紹臺灣的風俗、習慣、信仰等。其中，在「土俗」即臺灣漢人爲主的風俗習慣部份，吸食鴉片是重點之一；而在館內的料理店，也有纏足之臺灣少女供應茶點，這都彰顯出臺灣作爲「他者」的奇風異俗。此外，館內又設有台南篤慶堂模型，紀念在日本與清朝簽定〈馬關條約〉之後，出兵接收臺灣期間而感染瘧疾，最後病逝於台南的日軍近衛師團長——北白川能久親王，以彰顯日本「文明」征服「野蠻」過程中的「犧牲」。

日本建構其針對臺灣的知識體系與殖民論述，與伊能嘉矩在1896至1900年間對臺灣原住民的資料收集與田野調查是分不開的。伊能嘉矩還是這次博覽會中爲臺灣館的設計而奔走效力的關鍵人物。因此，作者在第三章專門探討伊能嘉矩在建立日本對臺殖民論述和知識體系中的角色。從更廣闊的歷史脈絡來看，日本建構其針對臺灣的知識體系與殖民論述，其實與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建構其針對殖民地的知識體系，並無二致。因此作者處理了伊能嘉矩的問題之後，更進一步在第五章探討伊能嘉矩的老師、留學英國的人類學家坪井正五郎的思想。坪井正五郎認爲，日本民族是混合種族，在世界競爭的舞台上佔有優越地位，擁有教導落後民族的條件，因此必須了解落後民族的特性，加以識別利用、取長補短，以增進日本全體民族的福祉。可見，坪井正五郎的這種學術主張，正好得到其學生伊能嘉矩的大力實踐。

作者在第四章，介紹博覽會中的學術人類館。該館陳列21名「異人種」（北海道愛奴人5名、臺灣生蕃4名、琉球人和朝鮮人各2名、中國人和印度人各3名、爪哇人和保加利亞人各1名）。把「落後」的「他者」的活人樣板，加以收集、陳列、展覽，可以說是歐洲殖民知識體系的最徹底的體現，絕非日本的獨創。歐美各國的博覽會，早有類似的設計。而日本無疑也通過這種

展示，確立日本自己的「文明人」的地位。

但是，帝國的確立，除伴隨着對外的殖民侵略、對「他者」的建構與宰制之外，也伴隨着內部的自我殖民、對「內部他者」的標籤與排斥。作者在第一章，探討大阪為博覽會選址及建築會場的過程。博覽會的場址，定於大阪城南的日本橋大道附近的「細民部落」區即貧民區。當時輿論，深以貧民區的惡臭、犯罪、傳染病現象為憂，又謂博覽會期間，有眾多外賓參加，貧民區的種種污穢落後，必將損害日本的國際形象。因此，當局不僅拆毀部份貧民區住宅，拓寬街道，還計劃大力發展大阪港口，確立大阪的「東洋商都」、「世界都市」的地位。

松田京子表示，此書的思路，深受美國學者薩義德（Edward Said）的啓發。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指出，西方通過知識建構，把東方表述成異己的、非理性的、次等的、有待研究的「他者」，而西方則扮演理性的、優越的、負責研究和解釋的「我者」。松田京子不止一次提及，日本通過大阪博覽會，展現「他者」的次等地位，確立日本帝國的「我者」的優越地位，其實也是「日本的東方主義」的操作。其書取名「帝國的視線」，原因也在於此。

然而，更直接和全面啓發松田京子研究方向的，是吉見俊哉的《博覽會の政治學——まなざしの近代》（博覽會的政治學——視野的近代化）（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松田京子自己明確表示受吉見啓發最深。僅看書名，已不難發現吉見的「視野」與松田的「視線」之一脈相承。吉見俊哉認為博覽會是19世紀末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定產物，本質上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戰場。事實上，福柯（Michel Foucault）有關現代權力操作形態的研究，以及薩義德「東方主義」的理論，並非近年才出現的突破。但是，把這兩家理論運用在博覽會研究，並強調19世紀末帝國主義時代特徵對於博覽會影響的，則非吉見俊哉莫屬。吉見俊哉可以說是從社會史角度研究博覽會的奠基者。至於偏重從人類學角度研究博覽會的，可參考吉田憲司，《文化の「発見」——驚異の部屋からヴァーチャル・ミュージアムまで》（文化的「發現」——從奇異館到視像博物館）（東京：岩波書店，1999）。松田京子在其書中，也有提及吉田此書。

又據松田京子的介紹，日本的博覽會研究，除吉見俊哉一派之外，還有三個流派：從技術史角度，探索博覽會的動向，其代表人物為吉田光邦；從經濟史角度，探索博覽會對於日本產業發展所充當的角色，其代表人物為清川雪彥；從政治史角度，探討博覽會所反映的主辦者的目的，其代表

人物有國雄行。就從政治史角度研究博覽會的著作而言，筆者可補充Ayoko Hotta-Lister（堀田綾子），*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of 1910* (Surrey: Japan Library, 1999)一書。此書研究1910年日本在倫敦舉行的日英博覽會（恰好與清朝的南洋勸業會同年），指出自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及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崛起引起歐洲列強的不安。即使在1903年與日本締結「日英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的英國，也開始對日本產生疑忌。1910年8月，日本通過所謂「日韓合併」吞併朝鮮，此舉令日本的國際形象更加受損；同時，第二屆「日英同盟」也抵期滿之年。日本就選擇在這關鍵的一年在倫敦舉辦日英博覽會，一方面淡化國際傳媒對於「日韓合併」的關注；另一方面增加歐洲對於日本的認識、改善日本的國際形象；此外也鞏固與英國的關係。結果，日英博覽會非常成功，日本三方面目的都完全達到，其中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一年之後，1911年7月，日本與英國締結了第三屆「日英同盟」，為期十年。

最後，順帶一提，有關中國博覽會的中文文獻，近期較為大型的文獻出版，當數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的《中國早期博覽會資料匯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此書凡七鉅冊，前三冊係宣統二年（1910）年南京南洋勸業會資料，後四冊係民國十八年（1929）杭州西湖博覽會資料。篇幅不可謂不龐大，但闕漏處也自不少。姑就前三冊有關南洋勸業會資料而言，其內容包括：籌辦是次活動的主要官員兩江總督端方的奏摺、《東方雜誌》和《申報》的有關報道、與會產品轉運規則、與會產品分類大綱、得獎名冊、指南、圖說、遊記、雜詠、紀念冊、報告書等。其中，端方奏摺其實又已登載於《東方雜誌》之中，以致一文兩收。但是，清政府《商務官報》中之有關記載，竟未予收錄，即使《申報》有關清政府與上海總商會就勸業會資金所發生之糾紛的報道，也未予收錄，實為可惜。另外，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與世博——歷史記錄（1851—1940）》（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頁數不多，但廣泛收錄和摘譯近代中外博覽會的文獻資料，也頗具參考價值。

至於有關清末中國參加和舉辦博覽會的中文研究著作方面，內地似以馬敏為主要代表，他從1980年代末開始研究清末博覽會，並留意到張謇對於中國博覽事業的推動，闢專章予以探討，見氏著《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研究》（武昌：華中師範大學，2001）一書中，〈張謇的經營理念（下）——張謇對近代博覽事業的認識及其實踐〉一章（頁248-272）。臺灣方面似以趙佑志的研究較為全面，見趙佑志，〈躍上國際舞台：清季中國

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1997年6月〕，頁287-344）。近期則有程佳惠《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臺灣SHOW》（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此書改編自作者的碩士論文，圖文並茂，文筆通俗活潑，與一般嚴肅乾枯的學術著作大異其趣；但書中運用了吉見俊哉的論點，留意到關博覽會與近代殖民論述和帝國主義運動的關係，亦留意到1935年臺灣博覽會作為日本殖民臺灣四十周年（用日本的術語是「始政四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是日本帝國主義論述的操作。此書之基調，與吉見俊哉、松田京子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

卜永堅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Culturing Modernity: The Nantong Model, 1890–1930.* By QIN SHA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xvii, 351 pp.**

近年西方學界出現了不少探討中國「現代性」的地方史研究。例如 Michael Tsin 的《國家、統治與現代性》（*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Canton, 1900–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探討廣州從清末到1927年追求政治現代性的過程，當中牽涉當權者希望打造一個統一團結的群體社會（unitary social body），但結果是社會更為分化。Joseph Esherick 所編的《重塑中國城市》（*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討論民國時期城市空間如何加入了現代性的元素，而同時又有意識地保存中國的傳統特色，以塑造中國身份認同。李歐梵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則討論以西方物質文明為基礎的上海現代性，如何影響居於上海的中國作家的文藝創作及文化活動。這些研究展現了現代性的追求，為中國的政治文化、都市空間，以至文化創作帶來的影響。

邵勤的研究亦是以地方社會為研究單位，及以文化及空間的變遷為中心，不同之處在於她以單一人物為出發點。作者考察作為地方精英的張謇及其家族，從清末到1920年代於上海以北的南通縣城所建立的為數不少的現代文化事業，如學校、博物館、劇院、報章、出版社、以至公園及鐘樓等。作者稱之為「展覽式的現代性」（exhibitory modernity），並嘗試指出地方精英